

# 89岁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开公车带村民上访,引官员责怪、网友力挺 杨维骏:别说我是最可爱的官员



杨维骏 新京报图片

新京报报道: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此举受到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责怪。杨维骏自称,因自己多次递交群众的信访材料,有人托人转告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

杨维骏说,那些村民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他们要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

据农民代表张桂仙介绍,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今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张

桂仙说,他和村民曾去上访过80多次,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但事情毫无进展。

12月17日,韩家湾村的400多名村民到社区街道办,要求政府出示土地征用与拆迁的相关手续,遭到拒绝。

张桂仙说,在村民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

12月17日,杨维骏从村民处听闻这一消息后,从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借调一名工作人员,并乘坐专车赶到现场。到达现场后,杨维骏命人拍照、摄像取证,并带着村民去省政协,“政协能监督政府,没有我带路,农民肯定进不了大门”。

12月18日,记者在杨维骏家采访,有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来访,他和杨维骏就带领村民上访问题辩论了两个多小时。该处长认为,杨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称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杨维骏回应说,“我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为群众反映问题?”

杨维骏向记者透露,他因为多次向省委省政府递交群众的信访材料,有人托人转告他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但他从不退缩。

## »连线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相关言行受到网友力挺,很多网友都称赞他是“最可爱的官员”,还有网友表示:若评2010年度“感动中国”人选,将投杨老一票。21日晚,快报记者采访了杨维骏老人。

## 上访村民的问题应能得到解决

现代快报:很多网友称您为“最可爱的官员”,体现了您的一种敬意,您是何感受?

杨维骏:我不能说是官员啊,我是老百姓啊。我是离休干部,“官员”只能是在职的。给我这么高的评价也不合适啊,我做了一些好事,不能因为我做了一些好事就说我是“最可爱的官员”。当然,对于网友的心情我很理解。

现代快报:在新京报报道之后,“以丹心照万民,甘造坎坷不甘别”传播甚远,这是您的座右铭吗?什么时候写的?

杨维骏:这句话出自我写的诗,题目叫《自勉》,前两句是“政坛千古唤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

现代快报:这件事发生后,媒体又予以了报道,您觉得这些农民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杨维骏:我想可以解决,我听说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相关处的干部已

经到当地询问农民代表,相关领导也说调查了之后会和我会面的,我想一两天就会会面的。

现代快报:我们知道,您受到了一些压力,那么这12位农民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

杨维骏:他们没有,但是介绍我去找农民的那个人受到压力了,说他是“疯子”,要他来劝我不要管闲事。

现代快报:现在不少地方,征地拆迁非要出了大事之后,才会引起关注,比如说自焚等。

杨维骏:这种事件太多了,现在是土地财政,赶农民上楼啊,强拆啊,一些地方官员又把农民的地强行拿走了。

## 要从机制上体制上解问题

现代快报: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认为您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称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那么在上访之外,公民反映问题、与政府官员沟通,还能有什么好的形式?要知道您说过“没有我带路,农民肯定进不了大门”。

杨维骏: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在云南,这种反映和沟通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可以说是不理不睬啊。

现代快报:如何从机制上消除您说的这种“困难”?

杨维骏:治本就要从机制上体制上解问题,我曾向高层撰文建议,比如说,颁布一个法规,规定政府决策必须经过一个规定的程序,

不能个人决策。现在出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领导一个人说了算。

现代快报:我们的规则是有的,但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不按规则来,甚至凌驾于规则之上。

杨维骏:现在很多问题也是纠缠不胜。中央派了相关巡视组到云南来,我也见过他们了,反映了一些问题。现在,农民想为自己维权是很困难的,确实是大门都难进,不理你,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理你,但是承诺了不兑现你也没办法。

现代快报:法制日报21日有报道称,公职人员强权言论频出,自称弱势背后可能藏腐败。事实上近来一些官员确实说了很多雷人的话。

杨维骏:现在反腐败的形势确实很严峻,一些官员就是权力在手不用白不用。这就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而要实现这个转变,就要按照对政府职能“通盘规划”的要求做,这四个字很重要,不能空泛地说转变政府职能,应该把目标、方法、步骤、进度、时间表等全部定出来,这样做才能兑现。我的建议是,任何关系到经济社会、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可行性研究,做可行性方案对比,这是从机制上限制,而体制上就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由管理型转为服务型,那么以权谋私就难了。这也是根治腐败的思路。

现代快报:您现在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吗?

杨维骏:有价值的我才会去参加,搞形式的我就不去了。我现在经常在自己的搜狐博客上发表文章。

快报记者 刘方志

## »今日视点

# “高铁时代”让铁路离民生越来越远

春运步入“高铁时代”,对于家住长三角地区的学生而言,返乡成本增加。沪宁高铁学生票最少也要110元,汽车票只需75元,不少手头偏紧的学生只好改坐长途车返乡。(12月21日《重庆晚报》)

春运来临,不仅是归乡的学生,其他将要乘坐铁路的返乡旅客,都将面对“高铁时代”下的痛苦选择。“高铁时代”之下,那张维系乡愁的车票,也随之“通胀”起来,变为游子的一另份忧愁。

高铁呼啸而来,它改变着生活方式,提升经济发展,却也伴随着高票价。规模浩大的高铁投资,自然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通过起出普通列车数倍的价格,以快速实现资本回报。

相关部门不遗余力的宣传,令我们曾经无限憧憬“高铁时代”的美好,相信速度缩短距离,经济鸿沟

将被高铁对接,却没料到迎头一棒,竟然是高不可及的票价。高票价击碎了普通人对高铁的幻想,开始盘算口袋里的银子,能否支付得起这个“超前消费”。据说,我们的高铁速度已经创下世界运营纪录,走在世界的前面,国民享受到最先进的技术。可是,这份“幸福感”来得太突然,消失得也快,囊中的羞涩,令我们在“高铁时代”汗颜。

在科技发展史上,新技术总是以更高的性价比脱颖而出,击败旧技术占领市场,太过超前的新技术,往往因失去消费者的青睐,而倒在昂贵的价格之下。目前来看,高铁票价阻碍了市场发展,消费者对高票价的认同度不高,在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的社会环境下,花费更多的钱来换取并不缩短太多的时间,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此,高铁走了另一条路,通过压缩

普通列车和动车的班次,将旅客赶至高铁之上。

这种被动式的高铁消费,无法收获民众的满意,反而诱发无数的抱怨。眼下正值通胀周期,万般物价均在大幅上扬,高铁票价不逢时,亦成为抬高GDP的一个因子。而民众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因通胀而存贬值压力,在开源尚无佳策之时,节流就是最好的应对方法。因此,民众不能改变高铁的票价,却能改变乘车的方式,用自己的选择给高票价投上一张反对票。

曾有人说,因高铁的开通,今年的春运,不仅要面对“买票难”的老问题,或许还将面对“票价高”的新问题。如今看来,此言不虚!(江德斌)

## 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民生

放眼望去,高铁轰鸣,一派欣欣向荣,这就是发展,这就是日新月

异。什么?票价贵了?嫌贵你可以不坐啊!汽车、轮船任你选,去年不是有农民骑摩托车千里返乡吗?今年不是有大学生改坐长途车回家吗?人家铁老大是稳坐钓鱼台,从来不会因为这些人“穷人”的离去而手忙脚乱。每年春节,在外忙碌了一年的打工者,归心似箭的学子都要去“挤火车”,无非就是个便宜。现在高铁满城飞,票价翻倍涨,有人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高铁的迅捷有目共睹,但发展的同时能不能兼顾一下民生呢?比如,在春运的时候多加开一些学生和农民工专列,普通车就行,车速慢点没关系,座位硬点没关系,没有空调也没有关系,只要票价便宜点,能把他们安全送回家就好。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而不是一些人享受着发展成果,一些人却要苦苦忍受发展带来的高成本。(于静)

## »公民发言

# 盛气凌人的副校长 足见高校行政化之弊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上课时,教室管理员以“锁门时间已过”为由催促下课。海闻与其起争执,称:“我可以明天就让你走人。”当事管理员称,目前工作未受影响。海闻婉拒采访。(12月21日《新京报》)

教室管理员按规定时间锁门,何错之有?拖堂耽误他人履行职责,本来就不对,岂能倚仗着副校长的身份以权压人?由此可见,不是校工挑战权威,而是副校长太过盛气凌人。

再回到拖堂这件事情上来,海闻校长为什么会拖堂?按照学生的陈述,是“由于此前少上了一节课,便拖堂一个小时”,这不禁让人质疑:教学本身是有计划的,为什么会之前少上了一节课以至于需要拖堂?按照海闻校长的职位,恐怕还是因为“领导太忙”。

但这并不是让学生拖堂、耽误校工履行职责的理由,既然承担了授业的职能,就必须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不能拿学生的休息时间和妨碍校工履行职责来填补自己漏下的教学任务。即便是有事情耽搁,也必须主动调整好时间,或者跟学生、校工、教务等进行沟通,而不能仗着副校长的威权,想拖堂就拖堂,想占用教室就占用教室。

此事反映出来的高校行政化弊端,并不是体现在校工干预拖堂的教学上,而是体现在北大副校长拖堂的行为和盛气凌人的话语里。透过海闻校长的咄咄逼人,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行政权力附体的高校领导特有的傲慢,另一方面我们更能看到忙于行政事务且身兼授业职责的高校领导对教学计划的轻蔑。而这,正是高校行政化的弊病所在,它的存在无论是对高校的运转还是教学秩序的维护,都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学生的时间、校工的职责是为教学服务,而没有理由为校领导服务。(时言平)

## »中国观察之樁樁专栏

# 经适用房何以屡屡成为公务员福利房?

又见公职人员瓜分经适房的新闻!

据《华商报》12月21日报道,陕西山阳县的一份“申请购买经适房人员名单”近日在网上热传。名单显示,932个申购经适房的人员中,九成以上为政府机关公职人员(其中带职务者多达183人),仅有13人为下岗职工,2人为退休人员。

这是一条似曾相识的新闻,大概也算得上令人麻木与审丑疲劳的新闻。如将新闻中的地名与数据略做修改,你就会发现相同的事例无数。譬如,用互联网搜索,同时输入“经适用房”与“公务员”两个关键词,便会轻松找到陕西西乡县、山东龙口、广东深圳、北京、武汉、西安等太多的地方都曾“出产”过类

似丑闻。社会大众习以为常,对经适用房卖给公职人员不再惊讶和愤怒了,仿佛经适用房本来就归公职人员所有。如果有一天,哪个地方的经适用房百分之地分配给了低收入者,那恐怕才算大新闻。

经适用房政策的指向非常善意,经适用房就是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难的,它既要经济又须适用。但经过政策执行者一层层“运作”,政策已经“变形”——经适用房小区越建越豪华,住宅面积越来越大,装修档次越来越高,出入小区的轿车越来越多。

譬如,深圳的侨乡村小区,建的都是140平米的大户型,总投资达14亿元。如山阳县这次被曝光的丰阳花园,是该县重点建设项

目,仅一期工程就投入了三亿元。该小区被群众质疑“是为政府部门领导干部量身打造”。山阳县政府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这次经适用房基本就是为全县各机关事业单位搞的福利房,普通百姓没一定关系是很难参与购买的。

此类房子别说跟经适用房无涉,就算是遵循申购准入标准,困难群众恐怕也买不起。鉴于越来越多地方的经适用房已成为事实上的公务员福利公房,因此我建议直接取消经适用房这一概念,改名为公务员福利房,这样就不会误导社会,误导低收入者。

我一直怀疑,经适用房是不是已被官方默许为公务员的福利房了?甚至,资格审核制度上的漏洞是不

是也故意拖着不补?如果不是这样,又如何解释经适用房弊丑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迄今为止,为何甚少见到有人被追究责任?叫停经适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何这项已经走样的政策依然坚挺?违规占有经适房的公职人员,完全可按贪污之类的罪名绳之以法。但事实上,事情曝光后,违法违规的公职人员不过是退房了事,甚至于真退还是假退都搞不清楚。

鉴于经适用房政策并不能真正惠及困难人群,且公信力近乎丧失殆尽,因此,最好尽快取消这一制度。将更多资金与土地用于建设廉租房,应该是更务实的选择。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新著《异论中国》问世)